对维特根斯坦意义用法论的述评

姚磊 惠颖

泰山学院外国语学院, 山东泰安, 271000;

摘要: 维特根斯坦在其后期的哲学中, 提出意义的用法论, 认为词的语义就是它语言中的用法。与以往的语义理论相比, 用法论具有一定的优越性, 但其自身仍存在缺陷。本文首先对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意义用法论进行阐述, 在肯定其解释力的同时, 尝试指出该理论的不足。

关键词: 维特根斯坦; 意义用法论; 不足

DOI: 10.69979/3029-2700.25.04.045

引言

维特根斯坦在前、后期哲学中, 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语义理论, 即图像论和用法论。后期, 维特根斯坦以研究语义问题为出发点, 批判了前期的图像论和当时为大多数的哲学家所接受的指称论, 提出了意义的用法论。

语义的用法论, 克服了以往诸如指称论、意念论、行为论、验证论、真值条件论的局限性, 并“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和语用学的发展, 做出了重要贡献”(王亚楠, 2010)。然而, 这并不说明, 该理论就无懈可击, 没有缺陷。

评价一个理论范式或者解释模式, 重要的是要看其解释力如何。本文在阐述维特根斯坦意义的用法论及其优越性的基础上, 着重对意义的用法论进行批判。

1 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用法论

1.1 意义用法论的提出

如前所述, 后期维特根斯坦以研究语义问题为出发点, 批判了前期的图像论和当时为大多数的哲学家所接受的指称论, 提出了意义的用法论。

在其著作《哲学研究》(Wittgenstein, 1953)的第一节, 维特根斯坦就提到了“意义即用法”的想法: “‘五’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? ——刚才根本不是在谈什么意义; 谈的只是‘五’这个词是怎样使用的。”第四十三节断言: “在使用‘意义’一词的一大类情况下——可以这样解释‘意义’: 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。”(陈嘉映, 2001: 185)。

2 对意义用法论的解读

在维特根斯坦看来, 词语乃至整个的语言, 在一定

意义上是一种工具, 依据不同的目的具有不同的用途, 其意义就在于它的用途。语词, 作为符号, 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意义, 其意义是在使用过程中被赋予的。“每个符号, 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没有生命的, 都是死的。它的生命就在于它的使用。”也就是说, 语言在使用当中才有意义, 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。

根据刘龙根的观点, 关于意义的用法论, 以下几点值得注意: 一、维特根斯坦在提出“意义即用法”的观点时, 并不旨在给“意义”一词下定义或者创立一种新的意义理论, 而只是对“意义”这个词的用法做出了描述。二、不仅同一个词语用于不同的语境常常意义不同, 而且同一个语句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, 意义也常常不尽相同。由此可以看出, 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词在具体语境当中的使用。三、维特根斯坦主张的语词的使用, 是指社会意义上的使用。四、语言的使用是社会生活形式的一部分, 生活形式是各种各样的。因此语词的意义取决于有关的生活形式, 亦即在相关的“语言游戏”中体现出来。

3 用法论的解释力

设想这么一个场景, 有人询问“天真”一词的意义。通常情况下, 解释者会举出一系列与“天真”意思相近的词语: “单纯”、“直率”、“轻信”、“缺乏社会经验”等等。然后补充说明, 这些词的意思和“天真”不完全一样, 并设想一个语境, 让对方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使用“天真”这个词。根据“被定义项=种差+邻近的属概念”的定义方法, 不难看出, 上述的解释方法不是在给“天真”这个词下定义, 而是在告诉询问者, 这个词怎么用, 即词的用法。

同样的一个词, 比如说“当”。在“选他当代表”

这句话里，“当”的意思是“担任；充当”；而在“我可不当家”中，“当”的意思是“掌管；主持”。同样一句话，“你真行啊”，如果是用在表扬别人的场合，就是对别人的肯定；但若是用作反语，就是表达对别人的批评和不满。

另外有些词汇，如“甚至”、“确实”、“诚然”等等，这些词根本无法下定义，这些词没有所指，也不能在脑中产生表象，更谈不上验证，也不存在真值的问题。徐烈炯（徐烈炯，1995）指出，“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用法，用法论至少在这方面克服了其他语义理论的局限性。”

4 对语义用法论的批判

语义的用法论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其他语义理论的局限，但是，其自身仍然存在缺陷。

4.1 本体论角度

在评价一种理论范式或者解释模式时，我们也可求诸本体论，看这种范式或者模式在本体论层面如何定位其研究对象，以及这种定位是否合理，其解释力如何。上边提到，维特根斯坦的“意义即用法”的观点，不是在给意义下定义，而是在说明“意义”这个词的用法。从本体论的角度讲，既然是语义理论，就应该就意义是什么展开研究。但从维特根斯坦及其研究者的说法来看，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就意义本身展开研究。

维特根斯坦认为，指称论、意念论等语义理论，都犯有一个共同的错误，把语义看作体(entity)，而不是看作用(use)，所以会提出以下问题：

(1) 语义是什么？

代词“什么”是专门用来代表体的（徐烈炯，1995，83）。举个例子，过年走亲戚，小王的一个朋友送给小王一箱苹果。假设小王事先并不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，这时小王就会用(2)来提问。

(2)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

如果小王已经知道里面装的是苹果了，他想知道的是这项苹果的重量，这个时候用(3)而不用(4)来提问。

(3) 这箱子苹果的重量是多少？

(4) 这箱子苹果的重量是什么？*

苹果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物体，可以用“什么”来进行提问。然而，重量不是体而是值(value)，不可以用“什么”提问。根据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说法，(1)和(4)

一样，都不能成立。如果想知道某个词语的意义，唯一的途径就是观察该词的使用方法。

其实，上边的例子有极大的缺陷。尽管上述例子中的(4)，在现实的交际里没有这种说法。但是，仍然可以这样说：“重量”是什么？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，重量是值而不是体，不能用“什么”来进行提问。但是，“‘重量’是什么？”这句话完全说的通，而且在生活中，人们也会这样说。类似的，如果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，长度也是值，也不能用“什么”来提问。但是，人们仍然可以说“长度是什么？”这样的话。

从上边的例子可以看出，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，是在摒弃“体”，也就是“是其所是”的基础上提出的。

其次，维特根斯坦认为，语词的意义是在使用中获得的。从“是其所是”的角度来看，维特根斯坦研究的不是意义本身，倒是在研究意义是怎么获得的。还是没能从本体论的角度，就意义是什么的问题做出解答。暂且把这个问题放一放，就意义是怎样获得的，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依然是有问题的。

语词是一系列的符号，本身没有什么意义，意义是在使用中获得的。那么，按照这个说法，人们在使用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符号。人们交际都是使用无意义的符号——这岂不是违背了逻辑？

设想下面一段对话：地铁上，一位白领起床起晚了，更糟糕的是，他身上没带任何能看时间的东西。他担心自己迟到，会受到上司的批评。于是，他在地铁上一直不停的问他身边的人几点了。

白领：现在几点？

乘客：七点五十分。

假设该乘客心理生理均正常，要理解白领所说的话的意思，该乘客至少应该知道“现在”、“几点”这两个词的意思。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论，上述这两个词的意义是在使用中获得的，那么在说这句话之前，这些符号是毫无意义的。那样的话，同为无意义的符号，为什么不去应其他的词语？这就说明，上边提到的这两个词语的意义，并不是在使用当中获得的，而是事先就确定存在的。

4.2 关于“用法”

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即用法。但是，他并没有对“用法”这个词下一个明确的定义。而且，并不是所有的用法都与语义有关系。先看以下几个例子：

(1)他的表姐是个女的。

(2)他的表姐是个男的。*

(3)这档电视节目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很喜欢看。

(4)这档电视节目，无论女男老少，都很喜欢看。*

在上边的四个句子中，(1)和(3)是可用的正常的句子，(2)和(4)均不能用。这两个不能用的句子，都是涉及到“男”、“女”的用法。(1)和(2)两句的语义显然有差别。表姐，顾名思义，是指女性亲属。而“男”的意思是“男性”，因此不能跟“表姐”搭配。但是(3)和(4)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否也有差别？(4)只是不符合汉语的习惯性用法，但是这种不合习惯的用法，是不是对其本身的语义产生了影响？

另外，我们知道，语言当中，表达相同的意义的词语，有些只能用于非正式场合，有些只能用于正式场合。这些词语在词典当中，都有明确的标注。比如在汉语当中，警察被称作“条子”。也就是说，“警察”和“条子”的意义是一样的。但是，在正式的文件当中，几乎从不用“条子”。这说明，“警察”和“条子”两个词语的用法不同。但是，这是否意味着，“警察”和“条子”这两个词的意义不同？还有，各种语言中都有一些俗语、粗话、下流话，这些话在很多场合是不可以使用的。这类用法上的限制，是否会影响语词的意义？如果不能给用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，不能明确地指出怎样通过用法分析意义，用法理论实际上是相当空泛的(徐烈炯，1995：85)。

其次，维特根斯坦及其追随者，并没有回答什么是“关系到语义的用法”(徐烈炯，1995：86)。例如：

(1)这种病不宜使用庆大霉素。

(2)动词“怀有”不宜使用被动态。

(3)青霉素不能过多的使用。

(4)“地”字不能多用。

(5)“电灯”这个词由两个汉字构成。

(1)和(2)说的是药品庆大霉素和青霉素的用法，(2)和(4)说的是词语的用法。(5)是关于一个词语的构成。但是(2)和(4)所说的用法，是词语作为一般东西的用法，

这里所涉及到的用法，与意义并没有联系。例如，(2)不能够说明“怀有”这个词的意思，也不能说明“怀有”和“拥有”等动词在意义上的区别，一般性的用法在语义学中根本起不到作用，没有地位。(5)当中，“电灯”这个词作为一般的东西进行谈论。在这句话，虽然用到了词语“电灯”，但是这句话并未说明电灯这个词语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“用法论”无法解释元语言现象，即语言作为一般性的东西时进行谈论。

5 结语

因为语词都是有法用的，所以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用法论，确实是克服了其他语义理论的局限性。同时，维特根斯坦提倡在语境中把握和理解意义，这为后来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但是，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讲，维特根斯坦脱离了“体”的概念，即没能从“是其所是”的角度对意义进行阐述，并且对意义的获得的解释，是不合逻辑的。另外，意义用法论，也未能对“用法”做出准确的界定，也没就哪些是与意义相关的用法进行说明。但是，维特根斯坦，这个哲学界的“幽灵”的贡献，仍然是不可磨灭的。

参考文献

- [1]陈嘉映.《语言哲学》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1.
 - [2]刘龙根.维特根斯坦语义理论刍议[J].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,2001,(5).
 - [3]王亚楠.评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义理论[J].太原师范学院学报,2010,(1).
 - [4]维特根斯坦.《哲学研究》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6.
 - [5]徐烈炯.《语义学导论》[M].北京:语文出版社,1995.
- 作者简介：姚磊（1990-），山东临沂人，泰山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，研究方向为语言学，泰山学院。
惠颖（1995-），山东泰安人，泰山学院外国语学院助理实验师。